



## 技可进乎道——魏源的道论

(2007-7-11 10:19:14)

作者：朱汉民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年间进士。早年曾从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晚清时期重要的今文学家，近代著名思想家，与龚自珍并称“龚魏”。

清朝乾隆、嘉庆以来，学术思想界盛行以考据训诂为主流的学术思潮，世称乾嘉学派。这种学术思潮很快亦暴露出严重弊端，那就是使知识学问脱离国计民生和生活实践，儒学的社会功能日渐丧失。为了纠正这一学术文化之偏，清道光以后学术风尚发生了重大转向，龚自珍、魏源等继承了汉代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以竭力扭转当时的学风。魏源曾受贺长龄所托，编《皇朝经世文编》，影响深远。他还关注河政、漕政、盐政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尤在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主权构成严重威胁之时，魏源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编有《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极富时代感的响亮口号。

魏源为学倡经世致用，对后世影响深远。梁启超说：“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1]。但是，魏源并没有将自己的学思局限在现实功利、经世技艺方面，他一直对“道”的问题有一种深切的关怀。这里，专门对魏源的道的观念作——追溯与剖析，以展示这位湘学代表人物的原道思想。

### 一、道的关怀

魏源是一位对现实充满忧患意识的学者，他的改革主张、经世情怀均源于此。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在魏源的思想深处，仍然也象历代儒生一样，充满着对道的深切关怀，这是由于，他对道的关怀与对现实的关怀是联为一体的。

魏源也象他前代的湘学学者一样，坚信这形而下的宇宙世界有一个形而上的根本，它是世界的主宰者和本原。他说：

万事莫不有本，众人与圣人皆何所本乎？人之生也，有形神、有魂魄。于魂魄合离聚散，谓之生死；于其生死，谓之人鬼；于其魂魄、寿夭、苦乐、清浊、谓之升降；于其升降，谓之劝诫。虽然，其聚散、合离、升降、劝诫，以何为本，以何归乎？曰：以天为本，以天为归。……大本本天，大归归天，天故为群言极[2]。

他所言的“天”也即是“道”，他经常将它们合称为“天道”。所以他也肯定“道”的本原性，提出“天地万物自道出”，“众甫与化流迁，而道则终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3]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天道的观念一直居于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我们知道，魏源不仅对乾嘉之学沉溺于繁琐的考证不满，对宋明诸儒离开社会实际而空谈先天无极亦强烈反对，他曾说过：“先天无极之说，君子所不道也。”[4]但是，他本人却仍然对推究形而上的“天道”表达出强烈的关注，这显然是由于他继承了中国思想文化及湘学传统中以天道为本根的精神，并且保持着对天道论的坚定信仰。

魏源所关怀和信仰的“道”，具有下面所论的一系列基本特征。

第一，恒常性。魏源认为，一切形下的气化世界均是变动不居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也是日变而不可复的，而只有那主宰世界的“道”才是恒常不变的，他说：“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5]

魏源还在《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中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他曾说：“伏闻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可亡，史不可灭。”可见，在他看来，“道”与形下的事物不同之处，首先在于“道”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永恒存在。

第二，普遍性。道不仅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永恒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弥漫空间的普通存在。魏源认为，在天地万物之中，无不贯穿、体现着“道”的存在。他说：“万物之生，未有一物不具此道者也。”[6]他还进一步指出，所谓天文、地文、人文的法则，其实均是“道”的体现，是“道”在空间上的“无垠者”的表现，他谈到“道”的普遍存在时说：“观乎天文以察变，观乎地文以理孙，观乎人文以化成，语乎其并包无垠者也。”

第三，唯一性。魏源反复强调“天道”是天地万物归于一的本根，因此，人们要在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世界中把握这唯一的“道”。他说：

君子之于道也，始于一，韬于一，积于一，优游般乐于一。一生变，变生化，化生无穷。所谓一者何也？地之中也有土圭，道之中也有土圭。九流诸子裂道一隅而自霸，道其任裂与？事在四方，道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7]

大地宇宙中“道”只有一个，所谓“圣人”，也就是把握了这个唯一之“道”的人。魏源强“道”的唯一性，是为了证明“道”是宇宙天地的唯一根本。但是，他也肯定“道”可以多样性地展现于世界，他推崇《周易》、《老子》、《孙子》三书，就是认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把握了那唯一性的“道”。他说：“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8]尽管“道”有不同形态的呈现，但是“道”本身只有一个。

第四，主客合一性，即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魏源所关怀、信仰的“道”，具有客观必然性，它是人的意志不可违逆的，他说：“谓道无心命物，于义为优。”[9]道之“无心”，言其客观性；“命物”，则言其必然性。但是，魏源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应该能认识道、体悟道，与“道”融合为一体。他在《默觚·学篇》的开篇首句就谈到“学”的问题：“学之言觉也，以先觉觉后觉，故萃野以畎亩乐尧、舜君民之道；学之言效也，以后人师前入，故傅严以稽古陈恭默思道之君。觉伊尹之所觉，是为尊德性；学傅说之所学，是为道问学。”[10]“学”包括“尊德性”、“道问学”两种途径，但都是为了认识，把握那普遍性的“道”。他进一步指出，人一旦认识、实践了“道”，使“天道”与“人事”合一，就可以达到“有神相会”、“造命立命”的精神境界。他说：

甚哉是非之与利害一也，天道之于人事一也！知是非与利害一，而后可由利仁以几于安仁；知天道之与人事一，而后可造命立命以成其安命。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而不仁者安仁矣；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而不知命者安命矣。[11]

“利害”（包括吉凶、得失）与客观情势相关，受制于客观必然的天命；“是非”与主观评价相关，取决于人们的善恶观念。魏源主张“是非与利害一”、“天道之与人事一”，也就强调“道”应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道”的主客合一性。

从魏源对“道”的思考和论述来看，他确是充满着对道的深切关怀。尽管他一直被认定为晚清时期“好作经济谈，而最注重边事”、“喜以经术作政论”，即充满经世情怀之士。然而，他所钻研的一切经世之学、治世之术，都必须有“道”的依托。所以，对“道”的深切关怀，一直是贯穿着魏源的学术思想，构成了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

面对浩瀚天地与沧桑人世，魏源坚定地相信有一个称之为“道”的形上存在支配、主宰着一切。这是他对前辈的湘学学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然而，魏源是一位开一代学风的近代思想家，他彻底否定了“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造”[12]的局面，将清朝学术思想界已分裂为三的道、学、政更新统一起来，从而使形上之道落到了经世致用的现实历史活动。

应该说，湘学史早就形成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将形而上之道体与形而下之器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船山之学，更是力图使“道”回归于器的现实世界、“理”回归于势的历史进程、“性”回归于习的生活实践，从而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统一起来。魏源的原道观念显然继承了这一湘学传统，尤其是继承发扬了船山学的道学观念。

魏源学术思想的代表作《默觚》共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学，下篇论治，正表达出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重要特色，就是将“道”的终极关怀与“学”的知识追求、“治”的经世情怀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儒家人文理想——道、学、政的统一。我们也将从“学”与“治”两个侧面来讨论这一特色。

首先，是“道”与“学”的统一。

人们常常发现，宋儒的特点是将“道”的信仰与“学”的知识结合起来，其实，宋儒只是强化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倾向，同时，宋儒在将“道”与“学”结合时，强调了伦理道德（义理）至上性。魏源是晚清时期倡导今文经学、呼唤经世致用的开新风人物，他仍然是将“道”与“学”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说：

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13]

由训诂、声音到典章制度，是由文字学到历史学的探求，这是乾嘉汉学的知识学特色；由乾嘉古文经学的训诂考据，再发展到道光时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今文经学才使得“天道”明朗起来，也就是完全达到“至道”的境界。在魏源看来，后者才是自己学术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只有西汉今文经学才算是“至道”呢？乾嘉汉学推崇东汉古文经学，这一学派的特征是“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是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14]而今文经学的研究则重在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这“大义”就不再是知识方面的文献考据、典章制度，而是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人文价值，即儒家的“圣人之道”，它们均属“道”的范畴。

魏源充满着对“道”的关怀和执著，但是，他坚信“文之外无道”[15]，也就是说，“道”是通过儒家经典、历史文献方得以一代代传递下来，那么，学者的使命就是要以“学”为本，在那些经典、文献中探寻“微言大义”，也就是探寻“道”。魏源潜心于经典、文献的研究，广泛地求师问学，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